

上海交通大学党史校史研究书系



福开森，1887年来华，1943年返美，是中国近代史上为数不多的在华工作、生活时间超过五十年且事业有成、颇有影响的外国人之一。

福开森 在华五十六年

参与兴办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视角

郭锋
著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

本书获上海交通大学党史校史专著出版基金资助

福开森 在华五十六年

参与兴办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视角

Fifty-Six Years of John C. Ferguson in China:
Focus on His Participating in
Building Modern Higher Education of China

郭锋 著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

内容提要

福开森是中国近代史上为数不多的在华工作、生活时间超过五十年的外国人之一,他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经历了晚清和民国两个时代,并以传教士教育家、政府顾问、社会活动家和中国文化艺术研究者的身份,在清末新政、北洋政府外交、近代高等教育创办发展和中西文化艺术交流等领域扮演着重要角色。

本书按照福开森来华后,在南京、上海和北京等地工作、生活的时间顺序来写,分为“南京十年”“上海岁月”和“北京生活”三卷,以参与南京汇文书院暨金陵大学、南洋公学暨交通大学的创办、发展为中心,并对福开森在北京工作、生活的三十年,以及1943年返回美国以后的情况有所叙述。全书以中英文原始档案、信件等第一手材料为主要依据,资料新颖丰富,考证细致深入。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福开森在华五十六年:参与兴办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视角 / 郭锋著. —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9
ISBN 978-7-313-21057-9

I. ①福… II. ①郭… III. ①福开森—生平事迹
IV. ①K837.115.4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092476 号

福开森在华五十六年

——参与兴办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视角

著 者: 郭 锋

出版发行: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邮政编码: 200030

印 制: 上海盛通时代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mm×1230 mm 1/32

字 数: 692 千字

版 次: 2019 年 5 月第 1 版

书 号: ISBN 978-7-313-21057-9/K

定 价: 155.00 元

地 址: 上海市番禺路 951 号

电 话: 021-64071208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张: 26

印 次: 201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联系电话: 021-37910000 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我有我的机遇

生命中充满传奇

——福开森

感谢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术文库出版基金

引 言

福开森(John Calvin Ferguson, 1866—1945)是加拿大裔美国人,获波士顿大学学士和博士学位,美以美会传教士,1887年来华,1943年返美,1945年在纽约州的克利夫顿去世,先后在南京、上海和北京等地工作、生活了五十六年,是中国近代史上为数不多的在华工作、生活时间超过五十年且事业有成、影响显著的外国人之一。福开森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他经历晚清和民国两个时代,并以传教士教育家、政府顾问、社会活动家、中国艺术文化学者和文物收藏家的身份,在清末新政、北洋政府外交、近代高等教育和博物馆事业,以及中西艺术文化交流等历史事件中扮演重要角色。本书仅选取其中一个侧面,以个案研究的形式,对福开森在中国近代高等教育成长、发展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和做出的贡献,作展开讨论。

本书所谓“中国近代高等教育”,从性质上看,可以概括为政府举办的新式高等学校和基督教来华传教差会举办的新式高等学校两种类型。从内容上看,两种类型的教育活动除了办学宗旨有社会的和宗教的不同以外,在学校层次、教育程度、课程设置、教学手段和培养目标等方面可以认为是一致的。概括地说,都是指采用西方近代“学院”(College)和“大学”(University)等高等学校教育手段,传授包括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在内的现代科学知识,培养适应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转型发展需要的新式人才的教育。从时间上看,这两种类型的教育活动,都开端于19世纪60年代,与洋务运动同时发生;初见成效于20世纪30年代,以两者都初步形成比较完整的具有现代特征的、与今天的大

学教育有着密切传承关系的高等学校教育体系,以及将教会大学也纳入政府统一管理为标志。具体说,主要指 1862 年清政府建立京师同文馆,1864 年和 1879 年新教传教士在山东创办山东蒙养学堂(1876 年改名为登州文会馆, Tengchow College)、在上海创办圣约翰书院(St. John's College),到 1902 年、1903 年清政府颁布《钦定学堂章程》(“壬寅学制”)和《奏定学堂章程》(“癸卯学制”),在全国开展改传统书院为新式高等学堂活动;再到 1912—1913 年民国政府颁布《学校系统令》(“壬子-癸丑学制”),规定大学本科四年,分为文、理、法、商、医、农、工七科,1919 年新教传教士成立“14+1”中国教会大学联合会,^[1]初步形成传教差会的高等学校教育体系;以及 1922 年、1928 年和 1929 年民国政府颁布《学校系统改革案》(“壬戌学制”),规定大学教育四至六年,初步形成民国高等学校教育体系,颁布《私立大学及专门学校立案条例》和《私立学校规程》,将教会大学和复旦大学、光华大学、大同大学、大夏大学、中华大学、中国大学、中法大学、南开大学以及厦门大学等个人或社会团体举办的私立大学,一起纳入统一的高等学校教育体系,这样一个历时七十余年的时间段。这一时间段,与开始于 19 世纪 60 年代,包括学前教育、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在内的“中国教育近代化”总体进程是一致的。

福开森作为新教传教士的一员,可以说与清政府洋务派官员和民国政府教育部官员一样,都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发生、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主要起两种作用。

第一种是直接参与来华传教差会举办高等学校的活动。这些教会高等学校与初等、中等学校一样,奉行建立一所基督教影响下的好学校,提

[1] 所谓“14+1”中国教会大学联合会,是指该会最初成立时,只有燕京大学、齐鲁大学、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东吴大学、沪江大学、圣约翰大学、之江大学、福建协和大学、岭南大学、长沙雅礼书院、武昌博文书院、武昌文华书院和华西协合大学 14 所发起院校,次年又有北京协和医学院申请加入,成为第 15 位会员。有关成立经过可参见中华续行委员会调查特委会编《1901—1920 年中国基督教调查资料》一书,蔡詠春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1129—1134 页。

供以现代科学知识为主的普通教育的办学宗旨,既传播基督教知识,又传播现代科学知识。除了传播基督教知识遭到冷遇外,传播现代科学知识,包括引进西方先进的教育理论和方法,是得到中国社会尤其是社会上的认可、接纳的,从而使传教士举办的高等学校,既以本身构成为中国高等教育体系的一部分,又以其办学实践,对政府举办新式高等学校产生示范和导向作用。这部分教会学校虽然数量不多,但是影响很大。

首先,就学校数量而言,据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统计,19世纪60年代以前,传教差会举办的各类教会学校不过四五十所,其中没有高等学校。^[1] 19世纪60年代以后,笔者统计,到1877年新教传教差会在上海召开第一次全国传教士大会时,可以提供中等程度以上课程的教会学校约12所(见本书第二章讨论)。至20世纪10年代,据苏云峰《中国新教育的萌芽与成长:1860—1928》一书统计,整个教会学校的数量,1910年前后为747所,其中高等学校为16所。^[2] 这个数字,与同一时期(1909年)全国官办、私立新式学校总数为52348所相比,^[3]只是后者的1.4%。其中16所教会高等学校与153所官办高等学校相比,^[4]所占比例稍高一些,也只有10.5%。又据《教务杂志》(*The 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1899年3月号刊载的“1898年新教在华差会情况统计”提供的数字,至1898年,全国可以提供中等程度以上课程的教会学校共有74所。^[5] 如果以1918—1919年中华续行委员会调查特委会的统计数字来看,^[6]1919年教会学校的数量为6866所,占当时全国各类学校总

[1] 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27页。

[2] 苏云峰:《中国新教育的萌芽与成长:1860—1928》,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75—210页。

[3] 苏云峰:《中国新教育的萌芽与成长:1860—1928》,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24页。

[4] 苏云峰:《中国新教育的萌芽与成长:1860—1928》,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25页。1909年全国有大学堂3所,高等学堂24所,高等实业学堂13所,优级师范30所,专门学堂83所,合计153所官办高等学校。

[5] 《教务杂志》1899年3月号,第144—145页。

[6] 中华续行委员会调查特委会:《1901—1920年中国基督教调查资料》,蔡詠春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749页。

数(1916年129 739所)的比例为5.3%,其中教会高等学校(16所)与官办高等学校(89所)^[1]的比例为17.9%。

其次,就学生数量而言,教会学校的学生数量也不多。例如,据何晓夏、史静寰《教会学校与中国教育近代化》一书的统计,1922年全国公立、私立各类学校学生总数已近500万人,同时期教会学校学生总数则不到36万人,占全国各类学校学生总数的比例只有7%弱。^[2]但是,如同我们下面要提到的,这些教会学校由于多在东部、东南沿海和中部地区办学,整体上看数量不多,对新式教育的发生、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却是很大的。而且如果进一步细分还可以看出,这个影响,又主要集中在新式高等学校教育发生、发展的层面。比如说,从有关统计可以看出,至1916年,包括教会学校在内,全国共有大学或学院程度的新式高等学校30所,在校大学生5 000多人。其中20所为教会高等学校,有在校学生1 377人。^[3]3所官办大学,7所私立大学,有在校生3 639人。^[4]教会高等学校在校生成生比例,占总数的27%。也就是说,每100名大学生,就有近三分之一在教会大学读书,接受教育,这个比例还是很高的。

具体说,教会高等学校的影响主要有以下两点:

一是提供新式教育,培育新式人才,推动教育和社会进步。换言之,教会高等学校实际上成为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毕业生或去官办学校和私立学校任教,或参加官派留学或自费留学,或做医生,或投身工商业,或在政府任职,或从事其他教会工作(表1),他们在不同的

[1] 苏云峰:《中国新教育的萌芽与成长:1860—1928》,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40—141页。

[2] 何晓夏、史静寰:《教会学校与中国教育近代化》,广东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144页。

[3] 苏云峰:《中国新教育的萌芽与成长:1860—1928》,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57页。另外,归纳其他统计资料可知,这20所教会大学分别为:(1)教会大学联合会15所:燕京大学、齐鲁大学、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东吴大学、沪江大学、圣约翰大学、之江大学、福建协和大学、武昌博文书院、武昌文华书院、长沙雅礼书院、岭南大学、华西协合大学、北京协和医学院。(2)联合会外5所:沈阳文会书院、宁波三一书院、太谷铭贤学堂、岳阳湖滨学堂、福州华南女子文理学院。

[4] 陈学恂主编:《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下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344页。

职位上,以不同的工作,为中国的教育发展和社会进步做贡献。

用《1901—1920年中国基督教调查资料》一书编者的话说,就是“中国基督教教育事业是一项颇大的事业。一万名以上的中国男女职员,即几乎等于传教差会受薪中国职员的半数,贡献他们的全部时间从事教育工作。如果宣教士的比例相同,那么我们还要在这批中国教学人员以外,再加上大约3000名外国教育工作者”。这一事业发展规模是值得注意的,“他们是处于共同影响和共同动力之下的学校大集体的一部分”。“教会学校体系正在迅速增强中国教育家的队伍。各差会本部派遣来华充任宣教士、顾问和调查人员的具有大学程度的职员和教育专家,他们已经完成和目前正在从事的有价值的工作,是人们所不能不予以注意的。”^[1]

用原华中师范大学校长章开沅先生为“教会大学在中国”丛书所写总序中的话说,就是:“中国教会大学虽然只有十几所,学生所占比重也不过是全国大学生总数的百分之十至十五,但问题不在于数量,而在于质量。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特别是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后,教会大学在中国教育近代化过程中起着某种程度的示范与导向作用。因为,它在体制、机构、计划、课程、方法乃至规章制度诸多方面,更为直接地引进西方近代教育模式,从而在教育界和社会上产生颇为深刻的影响,既包括积极的影响,也包括消极的影响。由此可见,教会大学史又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不可缺少的重要篇章。中国教会大学尽管一般规模不大,但大多办得有自己的特色,特别是在农学、医学、女子高等教育方面具有领先地位与较大贡献。”^[2]

二是教会高等学校的课程设置、学科建设、教学方法引进、教科书编写、教务管理以及学校管理等办学理念和办学实践,对官办新式高等学校的创办、发展起示范和导向作用。

[1] 中华续行委员会调查特委会:《1901—1920年中国基督教调查资料》,蔡詠春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071—1075页。

[2] 章开沅主编,王国平著:《博习天锡庄——东吴大学》,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页。

表 1 1920 年教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情况统计 (单位: 人)

学 校	毕业 生数	教会 学校 教师	国立 学校 教师	医生	官员	国外 留学	工商	牧师	其他 教会 工作	其他 职业
燕京大学	513	154	15	40	—	31	24	87	40	122
齐鲁大学	815	214	—	87	—	3	70	156	13	272
金陵女子 文理学院	12	5	2	—	—	1	—	—	4	—
金陵大学	238	78	18	40	18	36	20	14	4	10
东吴大学	113	54	—	—	4	15	36	4	—	—
沪江大学	57	20	1	—	1	11	13	8	3	—
圣约翰 大学	420	45	31	9	11	25	283	16	—	—
之江大学	180	64	7	—	—	10	40	47	12	—
福建协和 大学	15	8	2	—	—	2	—	1	—	—
岭南大学	7	4	—	—	—	2	—	—	1	—
雅礼书院	15	7	—	—	—	1	2	5	—	—
文华书院	73	28	5	—	—	3	18	19	—	—
博文书院	—	—	—	—	—	—	—	—	—	—
华西协合 大学	16	3	1	4	1	3	—	4	—	—
总 计	2 474	684	82	180	35	143	506	361	77	406

原表见中华续行委办会调查特委会:《1901—1920 年中国基督教调查资料》,蔡詠春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1134 页。

用前引《1901—1920 年中国基督教调查资料》编者的话说,就是:“教会学校是政府在发展教育体系方面的有力助手。……教会学校具有工作的连续性,严格的监督制度,诚心而稳定的赞助。……教会学校往往被指责在教育的题材上过分保持差会派遣国的色彩,但是它们并没有外国化

到不能在共同基础上与国立学校的教职员共同讨论教学方法、学校设备、工业训练等问题。……国立学校没有照搬教会学校的模式,但是它研究教会学校并在许多方面加以仿效。”〔1〕

新教传教士推动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发生、发展的第二种作用,是以个人身份应聘,参与中央或地方政府兴办新式高等学校的活动。又分为两种途径,一是应聘为官办学校监院、总教习等教务、学务管理者,直接参与办学活动;二是在中央或地方政府做顾问,间接参与办学活动。这部分人的数量也不是很多,并主要集中在清末,比较著名的有丁韪良、丁家立、林乐知、傅兰雅、李提摩太、李佳白、赫士等人,福开森也是其中之一。但是,犹如教会学校数量不多影响却很大一样,这部分人数量虽然不多,影响却是很大的。最主要的影响,就是通过积极引进所在国家的高等教育理论、学科、课程、计划、教材、方法,以及机构设置、规章制度建设等学校管理方法,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构成一道独特的风景线,为所服务的学校采用或美国或英国的学制,形成各自的校风传统、办学特色或者说办学模式,做出了贡献。比如丁韪良为京师大学堂形成具有综合大学特点的办学模式,丁家立为北洋大学堂形成具有工科大学特点的办学模式,李提摩太为山西大学堂形成具有英国大学教育特点的办学模式,以及福开森为南洋公学形成具有美国大学教育特点的办学模式,等等,都做出了重要贡献。

福开森为之服务的美以美会,是美国来华传教差会在中国兴办教育事业的先锋队和主力军之一。至20世纪20年代,在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领域,美以美会举办的各类教会学校,无论是数量、质量,还是举办时间早晚,在各传教差会中都是名列前茅的。例如,就数量而言,据统计,1920年新教来华传教差会共举办各类教会学校6890所,其中美以

〔1〕 中华续行委员会调查特委会:《1901—1920年中国基督教调查资料》,蔡詠春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073页。

美会 923 所(在校生 36 577 人),^[1]占各类教会学校总数的比例为 13.3%。考虑到同时期共有 35 个大的传教差会(90 多个小一些的差会团体)在华举办教会学校,这个比例是很高的,居第一位。而且,与居第二位的北长老会(举办各类学校 816 所,在校生 21 778 人)相比,这个比例还高出不少:学校数多出百余所,在校生人数也多出近 15 000 人。若就新式高等学校教育领域来看,近代来华传教差会或单独或联合,共举办了 20 余所教会学院或大学,其中七八所创办和发展都与美以美会有密切关系:或者是由该会单独创办,或者是与其他差会联合创办,或者是以并入学科的形式支持发展,^[2]像福州鹤龄英华书院(1881—1923)、北京汇文书院—燕京大学(1888—1952)、南京汇文书院—金陵大学(1888—1952)、四川华西协合大学(1910—1952)、福州华南女子文理学院(1908—1951)、金陵女子文理学院(1913—1951)和福建协和大学(1915—1951)等,皆为其例。又例如,就举办时间而言,美以美会参与创办的几所学院和大学,年代都比较早。与北长老会、南长老会、圣公会、公理会、南监理会等较早举办新式高等学校的传教差会培养出狄考文、丁韪良、卜舛济、林乐知、潘慎文、丁家立、谢卫楼、赫士、库寿龄、裘德生等一批传教士教育家一样,美以美会在举办新式高等学校的过程中,也培养了一批像福开森这样的可以称为早期探路者的传教士教育家,例如福开森的引路人、发起创办北京汇文书院和南京汇文书院的傅勒尔,福开森的同事、福州鹤龄英华书院的武林吉、施美志、力为廉,北京汇文书院的李安德、刘海澜,九江南伟烈大学(现九江同文中学)的库思非,华西协合大学的必启,等等。包括福开森在内的这些早期探路者或传教士教育家,以其满腔热情和艰苦努力,都曾经为推动新教在华教育事业,尤其是新式高等学校教育的发展发挥过重要作用

[1] 中华续行委员会调查特委会:《1901—1920 年中国基督教调查资料》,蔡詠春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818—819、836 页。

[2] 例如金陵大学医科的前身为七传教差会联合创办的华东协和医学院,1912 年并入金陵大学,归美以美会等三差会组成的金陵大学董事会和理事会管理。

用,主要可以概括为两点:一是在校舍校园建设和人力、财力、物力资源配置等方面,为早期教会学校的创办和后来教会大学的发展奠定基础,创造条件;二是在课程设置、学科建设、办学定位、办学理念凝练、培养目标设定、培养方式创新以及学校管理模式探索等方面,为早期教会学校和后来教会大学的成长发展积累宝贵的经验。研究早期探路者传教士教育家的办学活动,了解他们的教育观点、办学理念,总结他们的办学经验,对了解新教在华高等教育事业的发生、发展过程,教会学校校风传统和办学特点的形成,以及早期传教士教育家在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影响,都具有重要意义。

福开森经历具有代表性 福开森是中国近代史上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之一。他的一生,可以说是把一切献给中国的教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一生,有为、有功于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一生。他自 1887 年受美以美会派遣来华从事传教工作,参与创办南京汇文书院,1897 年接受盛宣怀聘请,参与创办南洋公学,到 1943 年以日美战俘交换人员身份返回美国,前后在中国生活了五十六年,历经清末新政、民国北洋政府和南京政府三个历史时期。他不仅是传教士、教育家,还是中国艺术文化学者,也是清廷两江总督府、湖广总督府、民国北洋政府和南京政府正式聘用的洋人顾问,先后获得过清廷“赏给二品顶戴”、二等第三双龙宝星勋章,法国政府荣誉军团“红带”勋章,民国北洋政府“一等嘉禾”“二等文虎”勋章,南京政府“一等采玉勋章”和嘉奖令等多种奖励。基督教新教在华传教历史上,像他这样“三栖”于教育、政治以及学术文化领域,且每一领域都取得很高成就的传教士还不多。其他有成就的传教士多为“两栖”:或在从事传教事业的同时兼职于教育,成为传教士教育家;或在兼职于教育的同时做学术研究,成为学者型教育家。总之,福开森还是为数不多的为传播基督教福音而来华,反而被中国文化所同化,成为“中国通”,致力于向西方介绍中国艺术文化的传教士之一,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对福开森的一生如何评价,国内学术界 20 世纪 40 年代以来有不同

观点,并且大致可以描绘出一幅40年代肯定、50年代以后否定、80年代以来重新评价的路线图。其中40年代的肯定,主要基于福开森在中国近代教育、政治和文化学术领域所做的贡献,可以说比较全面、到位,符合实际,虽然也有历史局限性。50年代以后的否定,主要是给福开森扣上“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分子”或“美国特务”的帽子,与特定的历史条件 and 政治文化背景有关,是在新中国成立后中美关系恶化的基础上,戴着“宗教为帝国主义文化侵略服务”的有色眼镜看待中国近代史、评价历史人物的反映。80年代以来重新评价的基调是肯定,特别是肯定福开森参与南京汇文书院—金陵大学和南洋公学—交通大学的创办等办学活动,对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发生、发展所做的贡献。这一基调应该说是实事求是、客观公正的,虽然如下面就要谈到的,所有评价观点都是在讨论有关问题时一带而过、举例提及,专门而深入的研究文章则还不多。

与其他新教传教士一样,福开森是中国近代受西方文化冲击影响走上转型发展道路这一特定历史时期出现的特殊历史人物。他的一生,他在华工作、生活五十六年所作所为,所取得的成就、做出的贡献,可以说都是与这一特定历史时期中国社会的转型发展,尤其是教育的转型发展,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一部中国近代史,就是一部在西方文化冲击影响下,以工业化、民主化和对外开放为主要特征的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发展的历史,亦即从传统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向近现代社会、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社会转型发展的历史,从传统教育向现代教育转型发展的历史。促成这一转型发展的历史因素很多,19世纪60年代以来的新教来华传教差会在华举办新式学校,引进、传播新式教育的办学活动,应该说也是重要因素之一。而福开森在中国工作、生活五十六年,一定意义上可以说皆与举办新式学校,引进、传播新式教育密切相关:先是清末参与创办南京汇文书院于南京、创办南洋公学于上海,为促进新教在华高等教育和官办新式高等学校教育的发生、发展做贡献;继而是民国受聘为北洋政府总统府顾问、南京政府行政院顾问、故宫博物院文物鉴定委员,为

北洋政府处理国际关系,维护国家利益奔走出力,为南京政府博物馆文化建设做贡献;与此同时,心系“南洋”,情钟“汇文”,始终关注和支持交通大学和金陵大学这一所官办大学、一所教会大学的发展,不仅作为校友、校董,有时间就尽量出席两校的校庆和校友会活动,以及金陵大学的理事会/校董会年会,还设立奖学金于交通大学,捐赠毕生收集的千余件珍贵文物给金陵大学,为促进两所大学的成长、发展做贡献。即使 1943 年返回美国以后,也不顾旅途劳累,身体健康变差,坚持在纽约、波士顿、俄勒冈州的尤金和加拿大多伦多等地的大学和学术团体作演讲,为使更多的人了解中国、关注中国而呼吁。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可以认为福开森的一生,是把一切献给中国的教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一生,有为、有功于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一生。

南京汇文书院和南洋公学的创办发展具有典型性 福开森参与创办了两所新式学校,一是南京汇文书院,一是南洋公学。其中南京汇文书院作为教会学校,在发挥前述第一种作用方面表现优秀,成绩突出。这所学校创办于 1888 年,是美以美会、基督会和北长老会等传教差会 1910 年联合创办的金陵大学前身,福开森以首任院长的身份参与创办活动,并为这所学校服务了十年。在他主持校务期间,汇文书院不仅发展成为全国知名的教会学校之一,而且还以坚实的物质基础和学术成就,为之后与基督书院和益智书院合并建立金陵大学的过程中占有优势,成为新大学的主体学校奠定了基础。金陵大学自 1910 年建立到 1952 年并入南京大学,单独发展的历史长达四十多年,是新教传教差会在华举办的规模较大、质量较高的教会大学之一。尤其是金陵大学保持的两项纪录,在中国教会大学发展史上始终没有被打破,一是在 1930 年代美国加州大学所做的中国教会大学评价中,被评为唯一的 A 类大学;另一项是本校毕业生具有直接进入美国大学研究生院学习的资格。可以说,一部南京汇文书院到金陵大学的发展史,就是一部教会大学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没有经验到成熟发展历史的缩影。研究这一段历史,对于我们了解中国教会大学发生、发展的历史

史,尤其是教会大学从书院体制走向大学体制的成长发展过程是有帮助的。

南洋公学是继北洋大学堂之后,清政府委派盛宣怀创办的第二所官办新式学校,福开森作为盛宣怀聘请的首任监院,从一开始就参与这所学校的创办工作。南洋公学创办于1896年,最初确立的办学目标是培养新式人才的文科学校,1904—1905年开始向工科学校转型发展。这一转型过程,以及其间探索形成的办学模式,可以认为在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发生、发展过程中具有代表性,产生过重要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探索举办中国最早的官办师范教育;二是探索建立附设小学、中学、预科和特科班的初等、中等和高等教育三位一体的学校教育衔接体系;三是探索建立“西学”和“中学”兼顾的学科设置和课程教学体系;四是探索建立体现“教授治学、民主管理”理念的教务管理制度;五是探索建立官费支持优秀毕业生的选送留学生机制;六是探索建立注重实验教学的专科教育模式。其中福开森的贡献主要在规划主持校园校舍建设,参与课程设置、学科建设、教务管理,以及引进外籍教师,助力教师队伍建设等方面。

进一步说,南京汇文书院和南洋公学,与其他教会学校和官办学校一样,都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这两所学校的办学实践,所秉持的办学理念和目标定位,所采用的教学手段、方法,所探索的办学模式,对于我们从个案研究的角度了解中国高等教育发生、发展的过程,官办或教会举办的新式高等学校是如何运作的,校风传统、办学特点是如何形成的,等等问题,是有帮助的。

比如说,教会学校也好,官办学校也好,新式高等学校在教育内容和教学方法上,最初都有一个从传统的经典教育向近现代的西方科学教育转变的过程,就南京汇文书院而言,这一过程是以一种种瓜得豆、推陈出新的方式发生、发展的。由于主要是招收中国学生,为中国社会提供教育服务,在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的问题上,这所学校秉持的教育思想、办学理念 and 采用的教学方法,主观愿望可以不论——当然是为了培养有信仰、有能力的传教人才,客观效果却是种瓜得豆,推陈出新,在传统教育领